

“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当代教育论丛

教育： JIAOYU
RANG LISHI QISHI WEILAI

让历史启示未来

◆ 吴式颖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国当代教育论丛

教育：让历史启示未来

吴式颖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教育：让历史启示未来/吴式颖著.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

(中国当代教育论丛)

ISBN 978 - 7 - 107 - 22323 - 5

I. 教…

II. 吴…

III. 教育理论—中国—文集

IV. G4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88343 号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http://www.pep.com.cn>

北京天宇星印刷厂印装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 毫米×1 240 毫米 1/32 印张：23 插页：1

字数：575 千字 印数：0 001 ~ 2 000 册

ISBN 978 - 7 - 107 - 22323 - 5 定价：40.9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7 号院 1 号楼 邮编：100081)



吴式颖 祖籍安徽省泾县。1929年生于河南信阳。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部前身）教授、博士生导师。1952年肄业于华中师范学院（今名华中师范大学）。1957年毕业于苏联国立列宁格勒赫尔岑师范学院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回国后被分配到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工作。1973年调入北京师范大学，主要从事外国教育史的研究与教学。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任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理事、国际马卡连柯研究会理事。独立撰著、主编或参与主编、编写了多部大学教材、教育学术著作与教育工具书。其中，《外国教育史简编》（合编）于1989年获全国首届优秀教育理论著作优秀奖；《外国现代教育史》（主编）于1998年获北京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外国教育史教程》（主编）于2002年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外国教育思想通史》（10卷本，总主编之一）于2003年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2006年出版了经过将近20年研究而撰写的专著《俄国教育史——从教育现代化视角所作的考察》，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主要有：《试论20世纪20~30年代苏联的普教建设和普教改革》、《20世纪70年代苏联教学理论中的教学过程问题》、《简介苏联德育过程理论的发展》、《拉夏洛泰及其〈论国民教育〉》、《克鲁普斯卡雅及其教育思想简论》等。

“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当代教育论丛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组编

理 事 长：吕 达

副理事长(按姓氏拼音排序)：

班 华	胡寅生	扈中平
陆有铨	裴娣娜	孙俊三
王 莉	王铁军	吴康宁
殷忠民	张志勇	

秘 书 长：刘立德

中国当代教育论丛

(按出版时间排序)

超越与创新	鲁 洁
教育论集	王策三
现代教育论集	成有信
教育改革与学术争鸣	萧宗六
教育问题的理论求索	孙喜亭
教育：传统与变革	顾明远
历史经验与教育改革	黄 济
高等教育：历史、现实与未来	潘懋元
优教与忧思	王逢贤
教育学的探究	瞿葆奎
教育理念的沉思与言说	胡德海
教育的困惑与诠释	李 放
教育：求真留痕	金一鸣
教学的理论与艺术	董远騫
教育：让历史启示未来	吴式颖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7号院1号楼 邮编：100081)

《中国当代教育论丛》

出版说明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进行，我国教育科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教育理论界不少学者在理论研究与学术实践中进行了艰辛的思考与探索。他们学风正派，治学严谨，几十年如一日追求真理，坚持真理，坚持科学精神，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们的精辟见解大都集中反映在凝聚着他们心血的一部部鸿篇巨制和大量学术论文之中。

系统地、科学地总结五十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教育理论的研究成果，这对于廓清教育理论研究的发展过程，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精华，揭示规律，为今后的教育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促进新世纪教育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组织编辑了这套《中国当代教育论丛》，由人民教育出版社资助出版。这套《论丛》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已列为“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这套《论丛》各卷的作者大多数是新中国第一代教育理论家。在长期的教育科学研究中，他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学术思想开放，工于学理分析，尽可能地揭示教育的客观规律，促进教育学科学化是他们不懈的追求。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始终关注着现实的重大

教育问题，或系统阐述，或直书议论，或发表评论，或提出商榷，撰写了一批对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学术专著及论文。这些专著和论文荟萃了我国教育理论研究的精华，折射出我国老一辈教育家对教育改革的艰辛探索与奉献。有的论文提出了不同的学术观点，甚至尖锐对立的学术观点，我们相信，实践会作出检验，时间会作出评判，读者会作出思辨。

这套《论丛》主要采取论文选辑的形式，每人一卷；收入的选文精选自著者发表过的有关论文，并附有题解；各卷的选文主题相对集中，一般按发表的时间排序；出于种种考虑，我们对每卷篇幅有所限制，对有些内容不得不忍痛割爱，这是需要向作者和读者特别说明的。

这套《论丛》的选编、出版，是我们系统总结新中国教育理论学术成果的初步尝试。教育学术界学者以及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给予了热情关注，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各卷作者付出了辛勤劳动。人民教育出版社一贯以教育事业为重，以学术为重，给予了大力支持和资助。对此，我们深表谢意。限于水平，这套《论丛》的编辑、出版工作中存在的不妥和不足，敬请读者不吝指教为感！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

2001年10月

自序：走向教育历史的深处

去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值此时机，在张斌贤教授等中年学者的建议、督促和陈露西、林伟等一些青年学生的具体帮助下，我对自己的治学之路进行了小结与反思，完成了我的这本定名为《教育：让历史启示未来》的自选集。在收集、整理自己所写的各种论文和书稿的过程中，不由得想起自己将近80年所走过的人生道路。我想借出版此书之际，谈谈个人求学的艰难之路和学术探究的一些情况、体会，或许对读者是有益的。这也是一种和读者进行对话和交流的形式吧！

一、求学时代

我的祖籍是安徽泾县，我于1929年农历9月24日出生在河南信阳。抗日战争爆发那年，我只有8岁。由于我的母亲是湖南长沙人，不少亲戚都在湖南，当日寇逼近信阳时，我们全家便逃难到湖南，后来还逃到过其他一些地方，抗战胜利后定居长沙。

日本军国主义强加给我们民族的灾难，加上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使我们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家也像全国许多人家一样，不得不背井离乡，过了八年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在那个年代，我和我的许多同龄人一样，在童年、少年时期经受了許多现代的年轻人不可想象的磨难。但是我也得到了许多热心人的帮助，使我得以时断时续地受到一些学校教育。因此，我的心里始终充满了对世界上一切丑恶现象的深深憎恨，对所有施惠于我，给了我教导的亲人、师长、同学和朋友们的无限感激和眷恋。

1949年长沙解放后我和父亲一起来到武汉。父亲这时已经失业有年，希望到武汉找份工作。我这时已读完高中二年级课程。由于深知父亲的困境，我希望能越级考上一所公立大学，以减轻家里的负担。在中学学习时，除语文学习得特别好以外，我还很喜欢生物和化学；加之儿时有一段时间住在湖南农村，懂得农民劳动与生活的艰辛，很想学些农业知识，帮助农民改进生产；所以我报考的主要目标是农业院校。父亲体会女儿的心愿，鼓励我寻找继续学习的机会。我跑了几所国立大学的招生办，都不接收同等学力的考生，结果报考了武昌华中大学（现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被录取在教育系。入校以后我有些后悔，因为它当时仍是一所私立教会学校，我在这里上学给父亲造成很大的困难。入校不久，我得知有政府举办的学习年限较短而且给予生活津贴的学校，就想退学。但华中大学的党团组织活跃，很快得知我这个穷学生的难处，对我非常关心。党团组织派专人与我联系，从思想和生活上给予我帮助，希望我克服困难，留在华大学习，并把我当做培养对象。在党团组织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从自己亲身经历中认识到一些中国革命的道理，明白了应该走为人民服务的道路。我留在华中大学教育系学习，第一年副修生物，第二年副修历史。1951年8月，华中大学与中原大学教育学院合并，改为以培养中学师资为主要任务的公立大学——华中师范学院，我的学习、生活费用也不用发愁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到处是一片朝气蓬勃的景象。我在这所新生的大学里学政治，学业务，参加一些革命实践活动。这时候我读了许多政治和历史书籍，也读了不少文艺作品。其中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痛悔，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

争’。”保尔的这一段话，也是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本人关于人生价值的表述，使我受到很大的感染和启迪。在后来的生活、学习与工作的各种考验中，我头脑里会经常出现“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的问题。

新中国的成立改变了国家的发展道路，也改变了我家和我个人的命运。1952年无论对于我家还是我个人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我父亲在武汉市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在一家煤店担任会计。他在这里工作了20年，于1972年12月退休。我在这一年由学校推荐到苏联学习。通过考试，我于1952年9月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俄语。次年8月，我们这一批四百多名年轻人由国家派遣到苏联和东欧的一些国家学习。我们感到无上的光荣和幸运，也深感肩负的责任重大，决心克服一切困难，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习任务，报答党和人民的培养。

从1953年9月至1957年6月，我在苏联列宁格勒赫尔岑师范学院教育系学习。四年的课程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逻辑学、苏联历史、俄罗斯与苏联文学、儿童文学、人体解剖学与生理学、学校卫生、普通心理学、儿童心理学、教育学、俄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俄语、俄语教学法、算术教学法、历史教学法、自然教学法、教育学专题课、教育经典名著研究专题课、教育心理学专题课、教学论和德育专题课、共青团工作、少先队工作、教学电影教学法和体育。由于在国内学习俄语的时间很短，语言准备很不够，到赫尔岑师范学院又是读本科，要随苏联同学一起听课，开始时什么也听不懂，学习困难的确很大。我采取的办法是上课硬听，课后借苏联同学的笔记来抄，借助于字典慢慢学习，并多看教师指定的参考书。学院图书馆的阅览室每天晚上11点半钟关门，我们中国学生总是在阅览室关灯时才回宿舍做晚饭吃，晚饭后还要学习一阵子，夜里两三点钟睡觉是经常的事。即便是在大约一年以后，自己在课堂上能听懂老师

讲课、能记笔记、学习容易一些了，但为了能学习得更深入一些，获得更多的知识，我自学的的时间仍然很长，睡觉的时间仍然很少。四年中我生活异常节俭，为的是省下生活津贴费，购买更多有用的书籍带回祖国。在寒暑假，我也很少休息，平时更少逛街和游玩。我的身体瘦弱了不少，有时甚至晕倒，但是我坚持下来了，获得了学校专业优等生的毕业文凭，为日后进一步学习与工作打下了基础。我在学习期间对教育史就有比较大的兴趣。给我们讲授俄国教育史的是俄罗斯教育科学院通讯院士加涅林（Ш. И. Ганелин）教授，讲授外国教育史的是我国教育史学界十分熟悉的《世界教育学史》的作者戈兰特（Е. Я. Голант）教授。经过他们具有丰富内容和感人的讲解，裴斯泰洛齐、乌申斯基、马卡连柯等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及其为人类教育事业献身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曾就裴斯泰洛齐的生平和教育思想写过一篇学年论文。在我带回国的图书中就有许多教育家的著作，其中包括《裴斯泰洛齐教育文集》（3卷集）、《乌申斯基教育文选》（2卷集）、《马卡连柯教育文集》（7卷集，中译本被称为“全集”）、《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10卷集），还有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思想家的教育文选。但是在苏联学习时我还没有确定自己的专业研究方向，而是做好了思想准备：一切听从党的召唤，并为发展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服务。

二、学术探究之路

1957年7、8月间，我回到久别四年的祖国，被分配到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工作。如果从我到研究所工作不久即被指派去接待苏联来华举办苏联国民教育展览的三名专家并参与编写《苏联国民教育介绍》一书算起，我从事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已经50年有余了。1957年年末，我还参与了凯洛夫主编的《苏联的国民教育》一书的翻译工作（这本书是为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而编写的，在我国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但是在当时，中央教育科学研

研究所的领导并没有找我谈过我的专业研究方向问题。1958年年初，教育部及其所属各单位都要派出一些干部下放山西省稷山县劳动锻炼，我也被派送到稷山去劳动锻炼了一年。1959年年初回所后，我仍随教育理论研究室活动。我认识到脱离教育实践的教育理论研究不会有什么结果，便积极参加小学教育调查。我所做的调查不是走马看花，而是深入到小学随班听课，重点研究小学算术教学，结果写成《试谈目前小学算术教学中的几个问题》一文。该文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9年第4期上发表。这是我所撰写的唯一一篇不属于教育史的论文，但它是参加工作以后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

我真正从事外国教育史的研究是从1962年开始的。在这一年的秋天，我参加了由我国当代著名的教育学家和外国教育史学家曹孚先生主持的《外国教育史》编写组。编写组的成员除曹孚先生和我以外，还有滕大春先生和马骥雄先生，共4人。此前，按照教育部文科教材编写办公室领导同志有关外国教育史教材可以借用苏联教材的指示精神，我已参与曹孚先生组织的将康斯坦丁诺夫等编著的《教育史》和麦丁斯基所著的《世界教育史》两书中的一些章节改编为我国高等师范院校外国教育史课程暂用教材的工作，初步确定了自己的专业研究方向。我以十分兴奋的心情参加新的编写组的工作。这一年我已是33岁的人了，但仍是编写组最年轻的成员，而且专业方向初定。编写组存在了将近两年。在这段时间里，我一面向前辈学习，一面独立完成分配给我的任务。分配给我的任务包括拜占廷的教育和大部分有关俄国、苏联教育的篇章。在曹孚先生的主持下，编写组的指导思想和努力方向十分明确，这就是：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尽量占有史料的基础上编出一部具有自己鲜明特点的外国教育史教科书；要突破以欧洲为中心，或仅以欧美为范围论述教育史问题的旧传统，而使新教材能够涵盖东西方主要国家和地区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历史发展进程，揭

示教育发展规律，总结外国教育的历史经验。我们首先拟定编写提纲。提纲是按分工由个人先提出草稿，全组逐章逐节进行讨论，最后由主编定稿。由曹孚先生最后拟定的《外国教育史编写提纲（初稿）》曾印发给全国各高等师范院校教育系征求意见。但是，按曹孚先生的安排，编写组成员并没有坐等意见的到来，而是按拟定编写提纲时的分工开始了撰稿工作。因此，到编写组的工作因其成员相继参加“四清”运动不得不中断时，已完成了部分章节的初稿，其中包括我写的“拜占廷的教育”。这两年，为了完成自己承担的任务，我读了很多有关拜占廷和俄国历史与教育的著作（主要是俄文书籍）。参加全书编写提纲的讨论，使我对外国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历程有了更加深入和全面的了解。这两年的学习与探究对我的专业成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1964年9、10月间，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领导安排我参加教育部及其附属单位干部第一批“四清”。于是，我成了最先离开《外国教育史》编写组的成员。后来，曹孚先生也下去参加“四清”，编写组的工作就完全中断了。一年以后我回到北京时，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增加新的领导人，并从全国各地调来了一批科研人员，准备成立教育科学院。但曹孚先生仍在下面参加“四清”，而我突患急性肾炎，住院治疗两月余，出院后还是忙于治疗。因此，“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前，我始终没有见到曹孚先生，也未能恢复专业工作。当时，我们自然没有预见到会发生迁延十年、对我国文化教育带来巨大损失的“文化大革命”，而编写工作的“暂时中断”会变成曹孚先生所主持的富有成果的《外国教育史》编写组的终结。关于这段经历和我在编写组所受的教益、编写组的工作成果及其成员之间结下的深厚情谊，我在《滕大春先生逝世三周年感怀》（见河北大学教育学院编：《滕大春先生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一文中已有具体阐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没有想到以后还能从事外国教育史研

究。1969年下干校前，抱着要当一辈子农民的想法，我将许多放在办公室里用的、从苏联带回的俄文书，包括《马卡连柯教育文集》和《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都当废纸卖了。我是在肾病并没有痊愈、腿脚仍然浮肿的情况下到干校去的，在干校又得了十二指肠溃疡。1971年下半年，我的胃病闹到难以进食的程度，于是被允许回北京看病，并担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留守工作。留守的任务之一是照看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图书馆。这个图书馆藏书极为丰富。按照老所长戴伯韬同志的意见，是要将它办成全国教育图书馆的。自从做留守工作，我与这个图书馆也结下缘分。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文革”期间被定为撤销单位。1971年末开始将干部分配到全国各地。我因为要做研究所财产清点工作没有回干校参加分配而留在教育部的留守处。这时，我才想到以后还有可能做专业工作，又开始读书，并开始学习许国璋先生编写的《大学英语》课本，以图恢复阅读英语专业书刊的能力。

1972年末或1973年初，我被暂时借调到国务院科教组（“文革”时期成立的全国科技和教育行政机构）的大学组工作，1973年5月至8月负责编辑《教育参考资料》，介绍外国教育动态。后来，科教组人事处又想把我转到外事组，仍属借调性质。我不太愿意做外事工作，又特别想得到一份正式工作，便请求调到北京师范大学。1973年11月，我的这一愿望得以实现。但没有过多久（可能就是在1974年春夏之间），我又被借到科教组，负责整理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图书馆。如前所述，该馆藏书非常丰富，但多年弃置不用，十分脏乱。不知是哪位领导想起要利用这里的图书，就又让我回去负责整理，还从北京图书馆借了两位很有经验的老同志，从科教组调来三位年轻人，我们一共六人在这里工作了一年多，我也借此机会读了更多的书。

在此期间，邓小平同志复出，协助周总理恢复“文革”中遭到破坏的国民经济和文化教育。1975年1月恢复了教育部的建制，

曾经担任过教育部副部长（1961年7月到1963年3月）和国务院秘书长的周荣鑫同志被任命为重建的教育部第一任部长（1975年1月上任，后受“四人帮”诬陷、迫害，于1976年4月逝世）。面对“读书无用论”泛滥、师道尊严尽丧、考试制度完全废止的混乱教育局面和千头万绪的恢复重建工作，周部长向教育部的干部提出要“学一点教育史”。他的这一要求是在多大的范围和对什么人提出的，我并不清楚。但正是因为周部长提出了要求，我被当时仍然是教育部的机关刊物《教育革命通讯》编辑部的同志请去讲了几次外国教育发展史。稍后，受该编辑部之约，我和潘懋元先生在讨论的基础上还写了两篇外国教育史方面的文章，其中一篇论述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派教育思想，另一篇论述以杜威为代表的现代派教育思想，两文的主旨都是在批判“文革”时期流行的“读书无用论”，强调系统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必要性。“文革”后期的这一经历使我对外国教育史研究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这就是说，外国教育史的研究不仅是为了编写教材，给学生提供外国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发展进程的系统知识，使他们获得忠诚于教育事业的陶冶，而且要总结外国教育的历史经验，为我国的教育改革和教育理论建设提供启示与借鉴。这使我受到很大的鼓舞。改革开放30年来，我对外国教育史的研究也是根据这两方面的社会需要进行的。

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那年，我已经49岁。和全国的同行一样，我以百倍的努力、夜以继日地投入外国教育史研究和学科建设。从1979年至20世纪80年代，我在《教育研究》、《外国教育》、《北京教育》、《浙江教育》等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在《试论20世纪20~30年代苏联的普教建设和普教改革》一文中，我以这一时期苏联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说明，普通教育即中小学教育的普及，是提高人民政治觉悟和文化科学水平的中心环节和办好各种教育事业的基础，普通教育的普及速度与质量既关系到扫盲的成效，又关系着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提高。该文还以

同一时期苏联普教改革中在对待本国文化教育遗产与外国教育经验、学制改革、培养目标与教育内容改革、教学理论和教学工作的组织等诸多方面所走的弯路说明，指导普通教育改革必须提高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自觉性，克服形而上学。^①在《从20世纪60~70年代苏联教育发展谈到瓦·阿·苏霍姆林斯基》一文中，我在介绍了20世纪60~70年代苏联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状况及其成就和苏联教育理论的发展以后着重指出：从苏联教育家成长的历史来看，我们可以清楚地区分出发展教育理论的三种途径：第一，通过长期教育实践，使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创造与发展教育理论；第二，教育调查；第三，教育实验。在当代的苏联，通过第一种途径发展教育理论的著名教育家有苏霍姆林斯基，通过第三种途径发展教育理论的教育家有赞科夫等人，而教育科学院的许多教育家，包括赞科夫，在进行“关于教育与发展的关系”的教育实验之前，采用的都是教育调查的方法。该文在详细述评了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及其科研道路以后指出：“我们认为，应该特别重视苏霍姆林斯基的科研道路和他热爱儿童、细心地研究儿童的精神。从教育学的发展史来看，世界的教育名著无一不是出自具有实践经验的教育家。中国的孔子、孟子、朱熹，外国的夸美纽斯、裴斯泰洛齐都是具有长期教育实践经验的教育家。他们根据自己对儿童和青少年掌握知识、形成道德品质过程的长期观察，总结自己的教育经验，参考别人的教育理论，作出了自己的理论概括。在他们的理论中虽然反映有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但也留下了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宝贵思想，推动了教育理论的发展，苏联的马卡连柯和苏霍姆林斯基走的也是这条发展教育理论的道路。我国需要有自己的教育理论家。重点中学的校长和教师们战斗在教育改革的第一线，有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具备成为教育理论家的条件。我们要勇于实践，善

^① 详见本书第449~466页。